

王西彦选集

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西彦选集

第 一 卷

中 短 篇 小 说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王西彦选集·第一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21.125 插页7 字数435千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书号：10374·60

(精装)定价：4.40元



作者一九三三年春在杭州

鄉井

快
21

「公，我這就。」

「你這就……」

於是，他走了。跨著一重一重的腳步，就著老主人的

了。……

了。……

這是一個大早晨，天大亮，陽光照在牆上，……

低壓的念頭，以及一個點點，……

……

……

……

益生福紙 (20 × 25) 條瓦兩用

作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寫《鄉井》的手稿

出版说明

现代著名作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西彦同志，出生农村，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在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影响下跨入文坛的。他在一九三三年发表第一篇处女作起，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解放前出版过十多个短篇小说集、评论集和六、七部中、长篇小说；解放后又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

《王西彦选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收辑了作者写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共五十九篇；第三卷选入作者写于四十年代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和《寻梦者》；第四卷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春回地暖》；第五卷散文，内容有童年杂记、报告、游记和回忆录。

王西彦小说的显著特色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描写生活”。选入的小说包括两类题材两种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农民、知识分子命运的体会、思索、感情，尽可能地纳入了小说的形式，有其独特的风格。

选入作品的目次，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沿着现实主义道路长途跋涉艰辛、曲折的足迹。

自序

从一九三三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转瞬已近五十年了。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作历程，我有着一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既有惶惑和自惭，也有坚信和自慰。我自觉沿着一条大体上接近现实主义的道路，一直走到现在，情形有如一个力弱的旅人，虽然有时难免感到处境的寂寞和步履的滞重，但始终朝着原来选择的目标，它通向我的乡土、祖国和人民。因此，当我决定编选这部《选集》，给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时，就无法克制一种想向读者倾吐长途跋涉的甘苦的冲动。

但是，创作既是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而回忆又往往彼此纠缠，互相牵连，一经触动就会纷至沓来，不易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我将向读者说些什么呢？踌躇再三，我想还是谈谈自己选择题材的依据和对待描写对象的态度吧？也许这会是读者所关心和愿意知道的。

不久以前，在一封来自浙东家乡的信里，把我称作“乡土作家”。虽然这个称呼并不十分贴切，我还是感到喜悦，并且想起了一位外国作家的隽言。那位外国作家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到底是什么决定艺术作品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的问题时，举出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乡土的感情，对母亲的崇拜”。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段使我感到亲切的话。有一次我用自已的语言复述它的大意，把对乡土的感情和对母亲的感情说成是互相联系甚至是同一的东西。理由很简单，因为正是对乡土和母亲的感情迫使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这一点，在这次编选《选集》时，就看得格外明显。

我没有给自己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做过精确的统计，说不出到底有多少篇是描写家乡农村生活的。我只记得，在三十年代初期最初学习写作时，我采用的几乎都是浙东家乡的题材。就拿收容在这部《选集》里的最早几篇来说吧，从《车站旁边的人家》和《摸秋》直至《寻常事》和《鱼鬼》，都没有例外。我还曾经把初期作品中四篇短短的小说，编缀在一起，给它们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悲凉的乡土》；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编入这个《选集》。此外，更有一些发表在三十年代报刊上尚未搜集到的，我还记得起其中有些习作的题目，也莫不是如此。还应该承认，我非常喜爱《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直到现在，只要一回忆起自己童少年时代的家乡农村生活，就会在脑子里展现出一连串令人颤栗的悲凉景象。

但是，令人颤栗的也不止是往日家乡的农村生活。自从青年时代离开浙东家乡以后，我带着安徒生童话里那只丑小

鸭的惊慌和惶惑，投身到城市生活里，获得了远较家乡更为长期也更为复杂的经历。就在这个时期里，自己成为知识分子，而且一直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为伍。当然不能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我不能不说，我觉得一经进入这片特异的国土，愈是熟悉它，痛苦也愈深沉。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我已经凭着初生之犊的勇气，起意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要为自己所属的一群诉说苦恼。单从这部《选集》里，读者就不难看出，从《两姐妹》以后，我的作品主要就描写两类题材，两种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过去那个黑暗时代里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呼号和反抗。而且，愈到后来，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就愈多。这自然是因为，一方面和家乡农村愈来愈疏远，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体会得愈来愈多，也思索得愈来愈经常的缘故。

早年读杜诗，对这位伟大诗人所描写的当时农民的悲惨遭遇，在吟诵诸如“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和“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之类诗句时，忍不住热泪盈眶。杜甫所描写的虽是一千多年前的华北，何常不适用于一千多年后的浙东！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奴隶社会里，农民多半被分化为奴隶；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则被地主阶级纳入农奴化的轨道。无论是奴隶也好，农奴也好，农民始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到了我开始懂事的年代里，农民的遭遇即使不是更悲惨，至少也没有比杜甫所描写的景象有多少改变。由于出身不同，我的母亲和姐

姐都是童养媳，叔伯兄弟们也多是贫苦农民，我并没有经历过鲁迅所说的“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并“羡慕他们的安乐”的阶段。我少年时代曾经侍候过牛嘴巴，知道为了使牛能够拉犁拖耙，非得让它们吃饱肚子不可；要是在放牧后牵牛回家，被大人发觉牛的一边“草肚”没有塞得鼓鼓时，就会受到责骂：“这样瘪着个肚子叫它怎么下得田呵！明天只好劳你去背重犁啦！”而且，夏天还要给它摘牛虱，冬天还要给他垫牛床。总之，要给它以温饱。就这方面说，我的有些叔伯兄弟们所得到的待遇，的确在牛马以下。

问题不只在物质生活上的受盘剥，更可怕的还在于精神上的受毒害。即使同是农奴吧，也还有驯顺和不驯顺的区别。在奴役者的眼睛里，当然以驯顺的为可取。既然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在不间断地制造不驯顺的农奴，为什么不设法来制造驯顺的农奴呢？因此，佛教的宿命观念和忍受哲学就成为最有效果的麻醉品。布施得福，许愿免罪，净土地狱，六道轮迴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我的童少年时期，我家楼上有间房子里，就一直设有一个庄严的佛坛。我那位经常坐在灶门下暗自流泪的母亲，就是一个最虔诚的信奉者，她一直以忍受作食粮，把希望寄托给渺茫的来世。她还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劝戒我的三个姐姐，她们都是从小就被“抱”给别人作童养媳，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后来我进县城读初中，校址是一处久已荒废的文庙，它右边是城隍庙，左边是东岳庙。在城隍庙里，大殿两侧塑画着阴森可怖的六道轮迴和阿鼻地狱的图像，却在正面檐下挂起一块金碧辉煌的横扁额，写着四个大字：“神道设教”，把权势者建庙塑像的深远用心点

得一清二楚。可是，这并不妨碍一些面容枯瘦、衣着褴褛的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磕头，捐烛助油。有什么办法呢？造物主总是公平无私的，如果不是罪孽深重，何至祖祖辈辈都受苦不尽？当然也渴望改变命运，但今生既已无望，除了向神圣祈求来世，还能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

正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鲁迅描写浙东农民的《故乡》和《祝福》。我觉得闰土和祥林嫂就是属于我的叔伯婶嫂一群的。因为今生的受苦是由于前世的有罪，只好在别人的施舍中特别去索取香炉和烛台，用来向神明祈求福泽，只好到土地庙捐助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写得多么真实，多么令人颤栗！虽然当时我已经见过家乡农民有组织的扑城运动，也见过驻扎在学校隔壁城隍庙里的省防军不分昼夜地拷打和枪毙从四乡捕捉来的“农匪”，但我的注意力仍然被普遍存在的闰土和祥林嫂们所吸引，在提笔从事写作学习时要走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因为闰土和祥林嫂们是我最熟悉的，他们渴望改变命运的努力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还凭着自己肤浅的理解，确信治疗农民被毒害的灵魂，远较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既忍受保甲长们变本加厉的敲诈盘剥，又遭到异族侵略者残酷无人性的蹂躏屠杀，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创伤，呈显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状态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这场全民族的生死搏斗中，不仅是真正的牺牲者，更是真正的给予者。我曾经在鲁南苏北的北运河两旁战地上停留，又在后方的乡村和城镇里奔走，我的确看得很多，也想

得很多。正因为这样，我才会为回答“谁在抗战”的严峻问题而寝食不安。我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答案，就等于在叔伯兄弟们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上加上一刀，就是对他们犯罪。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对艺术创造还缺乏经验，但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使命。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对自己的期许，情形很有些象一个心志高远的孩子，空望着遥远的目标发愣。且不说内容的深刻和艺术的完美了，单是原前预定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在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尽可能地纳入短篇和中篇小说的形式里的同时，我也曾计划创作三部描写我所熟悉的婢嫂姐妹们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并拟了个“农村妇女三部曲”的题名。但结果只写出了《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银花》两部，第三部《换来的灵魂》只保留着一份粗略的提纲。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已写出的两部就没有收在这《选集》里。

描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忧郁凄凉面容的第一人，也是鲁迅。他的名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描写一个原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大约十年以后就变成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随随便便”的自欺欺人的麻木者；又描写了另一个原是被人看作“吃洋教”的“可怕的新党”，他在到处碰壁以后竭力保持自己的倔强，结果竟然堕落成为原来被自己所不齿的人物，最后吐血而死时，“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从学生时代起，几十年来

我曾经无数遍地重读这两篇令人颤震的作品。而且，每一次重读它们时，总要使我联想到另一位我所终生崇敬的文学大师，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者契诃夫，联想到契诃夫那些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和剧本，我指的是例如《带阁楼的房子》、《第六号病室》、《我的生活》、《醋栗》和《没意思的故事》以及《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等名作。请听一听那个最终走上自杀道路的伊凡诺夫怎样劝告旁人吧：“我亲爱的朋友，您去年才大学毕业，您还年轻，还生气勃勃，可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我有权利给您忠告。按照老一套来生活下去吧。背景愈灰暗，愈单调，就愈好。亲爱的老弟，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对抗；不要和风车决斗；不要拿自己的脑袋去碰撞墙壁。把自己关在甲壳里，去尽上帝给您规定的卑微的义务吧，这样反而舒服得多，幸福得多，也诚实得多。”这难道不就是出自吕纬甫和魏连受之口的声音吗？我想，这总是由于当时俄罗斯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遭遇，才会在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出现面容和声音都如此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吧？但不论怎样，从契诃夫和鲁迅的作品里，都可以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曾经走过一条怎样曲折的道路，遭受过怎样的磨难，经历过怎样的斗争。

由于年龄和阅历，我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上有着很大局限。我只熟悉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人，我的祖辈、父辈以至于子孙辈。自然，我最熟悉的应该是自己所属的一辈，即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充满惊风骇浪的年代的一群。不待说，我也曾经以自己微薄的学识，从史籍中去窥察过更早时代前辈们的功业，对那些被鲁

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伟人充满尊敬。但给了我最深切的激动的，仍然只能是自己所亲身接触过的同时代人。在历史上，我们既有“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也有“明哲保身”的哲学，但知识分子好象从来没有过好命运。到了我自己也属于这行列的漫长的动乱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遇显然更为凄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民最受苦难的年代。我觉得，无论过去和现代，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和人民共呼吸，同命运，一起受苦难，也一起反抗和流血。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他们中间的先知先觉者。曾经有人说，知识分子中间有叛徒，但也有隐士；其实，在大多数场合，隐士也就是叛徒，归隐只是反抗的另一种形式。“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那样的人自然是有的，不过决不是知识分子的全体，也不能说是多数。

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描写自己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读者当然可以看出，我使用在这类作品上的色彩未免太阴暗了。我的主人公们不仅大都在灰暗的背景里行动，而且莫不有着一副阴沉悲苦的表情。有些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曾经在这一点上表示过惋惜甚至不满，我自己也曾经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所生活的年代毕竟和鲁迅当时不尽相同；契诃夫的时代则更为遥远，还有着国土的相异。据研究家们说，就是契诃夫吧，他也觉得有负于读者，因为他只是揭露了人类关系中残酷的喜剧和生活的矛盾，却没有指明出路，明确回答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怎么办”的问题。我还特别注意到契诃夫的讽刺喜剧中透露出来的欢乐气息和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至于鲁迅，大家更不会忘记他曾在自己过

分阴冷的作品里加添“亮色”。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光耀史册的文学大师，尚且如此尊重读者，我这个不成材的小学徒自然更应深抱自惭了。但我也曾作过自我辩解。不久以前，在一个专为海外读者编选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集的序言里，我写下如下一段话：

当我重读这十篇作品时，眼前仿佛出现着“折翅鸟”和“家鸽”们凄苦的表情，耳际也仿佛听见了“醉汉”悲凉的叹息和“小人物”愤怒的控诉。“在时代的暴风雨中，难道就没有振翅高飞的雄鹰，鼓翼搏斗的海燕吗？”如果有热中题材问题的读者发出这样的质问，我的回答将是：“在一个暴风雨的时代里，的确既有折翅鸟和家鸽，也有雄鹰和海燕。这弱者和强者，都曾经出现在我的经历里，都引起过我热切的注意。不过在我描绘下来的画幅里，更多的却是折翅鸟和家鸽。”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雄鹰和海燕是我们时代的“脊梁”，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而且雄鹰振翅和海燕鼓翼的姿势也应该是最美丽动人的。实际上，我也曾经有过描绘雄鹰和海燕的努力，并在这种努力里深感自己职责的庄严。我只是说，我们文学艺术的画廊很广阔，能容纳多种多样的题材，多种多样的人物。折翅鸟和家鸽也好，雄鹰和海燕也好，它们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这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彩。我在这里，不过给读者打开我自己的这个窗口。……

很明显，我这个辩解很无力，有些近于自我原谅。尤其是，我并没有说出自己更深藏的想法。契诃夫名剧《伊万诺夫》里的主人公，不是劝告旁人“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对抗”吗？我觉得，出现在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所走的只是一条“单人匹马”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尚且如此，那么，到了我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斗争如果不能改弦易辙，失败岂不要更加悲惨吗？但在事实上，在这条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当时的确曾经拥挤不堪，我不过只是摄取其中的少数场景而已。在艺术创造上，我是始终相信，描写了“不应该这样做”，只要写得真实，写得诚挚，读者是能够得出“应该怎样做”的结论的。这也正是文学艺术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我愿意回到这篇序言第一段里说的自己所走道路的问题。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我有时的确产生过无法排除的孤寂感。远在四十年代初，我就曾经在一个小说集的题记里，称呼自己的集子是一本“寂寞的小书”。也曾经有好心的读者写信给我，劝我放弃原来的写法，去采用较为华丽的辞句和更吸引人的情节。我知道，如果听从这个劝告，自己也许能够改变类似踽踽独行的处境。我感谢读者的关怀，却无法接受这种劝告，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寂寞感，主要来自作品写得不深刻，也缺乏足够的独创性。此外，在创作上我还有自己遵循不渝的信条。契诃夫要求文学艺术在描写生活时，要做到“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他又要求作家采取